

农户分化对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影响分析

——以重庆市梁平区为例

梁先婷

云南农业大学

DOI:10.12238/as.v8i3.2859

[摘要] 本文以重庆市梁平区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农户分化对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影响。通过对梁平区18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运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分化对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优化农户分化管理、强化农技培训体系等针对性建议,旨在促进梁平区种植结构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农户分化; 种植结构调整; 决策行为; 梁平区

中图分类号: S157.4+3 文献标识码: A

The Impact of Farmer Differentiation on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in Crop Structure Adjustment: A Case Study of Liangping District, Chongqing

Xianting Liang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Liangping District, Chongqing,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rmer differentiation on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in crop structure adjustment. Through field research on 180 rural households in Liangping Distri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method reveals that farmer differentiation exert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related to crop structure adjustmen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optimizing farmer differentiation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agricultural technical training system, aiming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crop 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Liangping District.

[Key words] farmer differentiation; crop structure adjustment;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Liangping District

引言

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农户分化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特征。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6亿人,较2010年增长37.2%,农户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兼业化特征日益凸显。这使得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业生产,兼业农户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以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以及纯农户等不同类型的农户群体。梁平区作为重庆市的重要农业产区,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分化现象明显,种植结构调整面临机遇与挑战。深入研究梁平区农户分化对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影响,有助于精准把握农业生产微观主体行为规律,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政策提供依据,对推动梁平区乃至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农户行为理论: 在农户分化的理论溯源方面, Lewis (1954) 提出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引发农户在收入来源和生产方式上的分化,这是早期对农户分化宏观机制的重要阐释,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框架^[1]。此后, Schultz (1964) 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于农户分化研究,从农户的理性决策角度出发,分析其在市场环境下基于资源禀赋差异选择不同生计策略,进而导致分化。中国学者结合转型期特点修正理论从而进行本土化扩展^[2]。例如,朱晓雨等指出,中国农户行为既不同于西方小农,也不同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需考虑政策干预(如农业补贴)和市场因素(如非农就业)的双重影响^[3]。综上,农户行为理论在中国经历了从引进消化到创新发展的过程,

学者们通过理论修正、实证检验与政策结合,逐步构建起适应转型期农村复杂情境的分析框架。

社会分化理论: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首次系统性地从经济基础角度揭示了社会分化的根源。他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归结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这种以经济因素为核心的“一元论”分析框架,成为早期社会分化理论的代表性范式^{[4][5]}。社会分层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特征,与工业化进程及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其影响渗透于社会治理体系、经济运行模式及文化价值取向等关键领域。农户群体内部的分化演进,本质上反映了微观层面的阶层流动机制,因此这为社会阶层理论框架应用于农户分化研究提供了学理依据。

1.2 研究假设

H1: 农户分化程度与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呈负相关;

H2: 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家庭特征(劳动力规模)及外部支持(农技培训)对调整决策存在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

问卷内容涵盖农户家庭基本情况、种植基本现状、种植结构调整行为意向以及销售情况等方面。通过详细的问题设置,收集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作物种植分布及调整情况等数据,为后续分析提供支撑。

2.2 数据来源

选取梁平区回龙镇、屏锦镇等十个区域的种植户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发放问卷和实地面谈访问相结合的方式,在2024年7月至2025年1月期间,共发放问卷181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80份,有效率99.4%。

3 梁平区农户分化与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现状

3.1 样本基本特征

农户个体特征:被调研者以户主为主,占比69.44%,女性略多于男性。年龄集中在40岁和50岁以上,合计占比超86%,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50%。多数农户身体状况一般,接受过农技培训的比例仅为22.78%。

农户家庭特征:家庭人口数主要集中在3-6人,4人家庭占比最高。务农劳动力和土地经营劳动力数量多为1-2名。多数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较低,60.56%的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低于10%。耕地面积以5亩及以下为主,占比70.56%,土地年产值普遍不高。

样本农户分化特征:纯农户占比最大,为60.56%;非兼农户占比21.67%;农兼非农户占比17.78%。在未来去向选择上,近半数受访者倾向留在农村,25.56%的人持城乡均可的态度,25%的人倾向去城镇。

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特征:92.78%的受访者在近十年调整过种植结构,75%的人未来有调整意愿,但仍有25%的人选择保持现状。

3.2 农户分化对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影响的初步分析

从数据来看,纯农户由于农业收入占比高,对农业依赖程度大,更倾向于维持或调整种植结构以保障农业收益;而非兼农户因非农收入占比较高,对农业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调整种植结构的积极性不高。这初步表明农户分化可能对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产生影响。

4 农户分化对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变量选取与定义

4.1.1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为被解释变量。以指标内各题项均值作为测度,题项采用里克特选项,表示被调研者对该题项所陈述的认同程度。

4.1.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户分化程度。以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比作为农户分化程度的度量,纯农户定义为非农收入占比低于10%的农户;非农收入占比介于10%至40%之间的农户为农兼非;非农收入占比在40%以上的农户为非兼农。

4.1.3 控制变量:本研究以被调研者为单位,引入了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通常对农户的经济决策和行为模式有显著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减少潜在的偏误,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和准确性。

4.2 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的模型设定如公式所示:

$$y_i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i c_i + \varepsilon_i$$

其中 x_1 为主要解释变量农户分化, y_i 是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 c_i 为控制变量, ε_i 为误差项,通过检验 β_1 的显著性,可以得到农户分化对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影响。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1显示,农户分化显著抑制种植结构调整(系数-1.9509, t值-8.28***)。经济依赖性降低是主因:非农收入占比提升削弱了农业经济支柱地位,农户倾向将资源投向回报更稳定的非农领域,而非承担结构调整所需的时间、资金及技术投入。风险规避机制同样关键,非农收入高的农户为规避农业技术革新和市场波动风险,更倾向维持现有种植模式。劳动力约束进一步强化此趋势:非农就业挤占农业管理时间,促使农户选择低维护作物或抛荒,而非精细化的经济作物种植。这本质是农户在收入多元化背景下,对农业边际收益与风险进行理性权衡后的保守策略选择。

性别因素也显示了对种植结构调整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在5%水平显著, t值为-2.8600,表明虽然该因素对决策行为有一定作用,但影响程度远小于农户分化。

年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未来去向选择、农技培训、家

庭劳动力等因素对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其显著性水平均在10%以上,因此这些因素在本研究中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R-squared值为0.4825,表明所选变量可以解释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约48.25%的变异,Prob>F值为0.0000,表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

表1 农户分化对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影响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显著性
农户分化	-1.9509	0.0024	-8.28	0
性别	-0.2832	0.0989	-2.86	0.005
年龄	-0.0113*	0.1137	-0.1	0.921
文化程度	-0.0936	0.0861	-1.09	0.279
身体状况	0.0077**	0.0748	0.1	0.919
未来去向选择	0.0475*	0.0603	0.79	0.432
农技培训	0.1457	0.1166	1.25	0.213
家庭劳动力	-0.0782	0.0604	-1.29	0.197
常数项	4.5125	0.7168	6.3	0
N	180			
Prob>F	0			
R-squared	0.4825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农户分化程度对种植结构调整的决策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收入占比每增加1单位,农户参与结构调整的意愿和行动力显著降低。从种植结构调整的决策行为来看,农户分化程度越高,农户在做出种植结构调整决策时就越趋于保守。非农收入占比较高的农户,他们的生活保障和经济来源更多依赖于非农产业,农业生产对其家庭经济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种植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风险更加敏感,担心调整后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自身利益,因此参与种植结构调整的意愿明显降低。总的来说,农户分化导致资源向非农领域倾斜,削弱了农业投入动力,同时加剧了信息不对称与风险规避倾向,使农户更倾向于维持传统种植模式。

5.2 对策建议

5.2.1 农户分化动态治理与资源协同配置机制优化。建立非农收入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对兼业农户非农收入占比实施动态跟踪,当监测值突破预设阈值时,自动触发差异化农业投资激励

政策(如所得税减免、生产性贷款贴息等),引导非农资本向现代农业领域流动。具体实施路径建议:

产业反哺机制创新:深化“乡贤经济”发展模式,在竹山镇、屏锦镇等工业重镇设立乡镇企业反哺农业专项奖励基金,重点支持订单农业、股权投资等合作形式。典型案例:引导工业企业与合作社共建稻米精深加工中心,开发柚子酵素、预制菜等衍生产品,延伸“梁平三绝”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增值超30%。

技术要素导入路径:建立“城市技术+农村场景”转化平台,鼓励外出务工人员以技术入股形式参与智慧农业项目。如在袁驿镇试点建设无人机植保联合体,通过“设备租赁+服务分成”模式,降低万亩柚园植保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5.2.2 精准化农技培训与产业升级协同体系构建。基础技能层:面向传统农户开设“田间学校”,重点传授标准化种植、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配套新品种试种风险补偿金制度(如柚树改良品种失败可获80%苗种补贴)。经营能力层:联合重庆数谷农场打造“电商+文旅”实训基地,开设农产品直播运营、休闲农业IP设计等课程,重点培育“柚见非遗”“梁平竹艺”等区域公用品牌,实现特色农产品溢价率的提升。产教融合层:推动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共建5G智慧农业实训中心,建立“培训-认证-就业”闭环体系。对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证的学员,签订包含保底收购价、优先采购权等条款的《技术成果转化协议》。

5.2.3 完善信息传播渠道,保障信息对称。不同类型农户对信息接收能力和渠道需求存在差异。传统型农户多为中老年,智能手机使用率低,他们主要依托乡镇服务站建立“网格化信息员”制度,通过定期走访、广播通知等传统渠道传递关键农情与政策;兼业农户则整合短信平台与微信服务号推送种植技术要点及市场预警信息,并设置夜间在线答疑时段。同时,建立梁平特色农产品单品数据库,关联全国产销数据,为农户提供全面、精准的市场和技术信息,避免农户因信息缺失导致生产决策失误,如化解“扩种一滞销”决策困境。合理分配技术、政策、资金与项目资源,促进农业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 [1] LEWIS, W.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 139-191.
- [2] Schultz T.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Reply [J].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966, 48(4): 1015-1018.
- [3] 朱晓雨, 石淑芹, 石英. 农户行为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影响的研究进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S3): 304-309.
- [4] 蔡翥. 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安徽大学, 2010.
- [5] 白杨. 社会分层理论与中国城市的类中间阶层[J]. 东方论坛. 青岛大学学报, 2002, (03): 47-52.

作者简介:

梁先婷(1999--),女,汉族,重庆梁平人,硕士在读,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农业管理研究。